

文化评析

三星堆遗址又“火”了!在这一轮考古挖掘中,新发现的6个坑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青铜神树、象牙等重要文物500余件。其中一件黄金面具体量非常大,有可能成为国内所发现的同期最大黄金面具和最重金器。一时间网上热议不断,甚至有媒体将三星堆称为“热搜顶流”。

公众纷纷讨论三星堆遗址,彰显了三星堆的独特魅力和深沉内涵,强化的是文化自信的力量。申言之,一个拥有高度文化自信的民族,其文明必定是持久、厚重、包容的,其自身主体性一定是鲜明、强烈、稳固的,三星堆遗址正印证了中华文明的如上特质。

三星堆遗址立足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厚度。3月22日,在福建武夷山市考察朱熹园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悠久绵延的中华文明如同一棵历史沃土培育的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从枝叶可以追溯到根脉。三星堆遗址便与古蜀文明的起源密不可分。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认为:“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是分别位于成都平原至川东及三峡一带的两支青铜文化,其文化面貌有很多相似之处,因而又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大文化圈(区)。自夏时时期起,这个文化圈内开始渗入一些二里头文化的因素,而至商时期,又大量接受了二里头和殷墟文化的影响。这就是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在我国考古学文化总谱系中的位置。”三星堆遗址共分四期,依次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夏代至商代前期、商代中期或略晚、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其中最早的宝墩文化距今约4800~4000年前,历史可谓悠久,其积淀亦因之深厚。

三星堆遗址彰显着中华文明的文明高度。恩格斯在其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文明时代乃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他进而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以此论析,反观三星堆遗址,其文明特征极为显著。从陶器上看,三星堆早期的陶器与二里头早期的陶器,除了陶质和大小以外,几无区别;三星堆的“将军盔”,也与河南安阳殷墟的同类器物非常近似。从青铜器上看,三星堆的铜尊、铜罍明显受到了殷商青铜器的影响,可知在与彼时中原文化的交流融汇中,古蜀文明得到了较大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其三、四期出土的诸多带有强烈信仰色彩的特征性器物说明,三星堆古城曾是雄极一时的蜀地共主——鱼凫王朝的都城。这恰可与《蜀王本纪》中“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开明”之记载相印证。古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神像、礼器和祭品,说明了古蜀文明的神权国家发展到了一个高峰,通过神权与王权的结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灿烂文明。

三星堆文明呈现出中华文明的交流广度。三星堆遗址具有东、西方文明的许多共同特质,是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灿烂结晶。依据已发现的诸如金杖、青铜雕像、海贝等文物,我们可以大致判断早在那时,古蜀国先人已与印度、中亚乃至两河流域的文明有所接触。由此设想,三星堆文明虽处于所谓“华夏边缘”,但却与西北方向的“陆上丝绸之路”很早就有着固定交通路线,南面可通过滇、缅、印之间的古道直接通往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沿海各地,甚至可以穿越历来被视为“人类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与该地域文明发生交往。因此青铜时代的巴蜀与外部世界,绝不是一个彼此封闭的空间,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给三星堆文明提供了走向世界的强力支撑。

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它关乎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历史脉络的探寻,对中华文明灿烂成就的理解,对中华文明世界贡献的把握,更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历史主体性、民族凝聚力的认知与塑造,意义堪称重大。80多年来,几代中国考古人筚路蓝缕、接续探索,终于让三星堆遗址绽放出绚烂的文明光辉。我们相信,此次的考古发现,也仅是辉煌博大的中华文明遗存之冰山一角,今后的发掘研究前景更可期,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事业定当再上层楼。

王学斌

科技兴警,助推公安工作质量与效率变革

周顺忠 薛宏伟 谢全发

光明论坛

中国新闻奖专栏 评论版投稿邮箱 gmpinglun@163.com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法治思想高度重视公安科技创新,强调“坚持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职责使命”;

要把大数据作为推动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大引擎、培育战斗力生成新的增长点,全面助推公安工作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公安科技创新绝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信息孤岛”,而是一项

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牢固树立协同的方法论。科技兴警亟须研发关于涉藏涉疆反分裂反恐怖斗争和维护稳定的科技手段,细化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侦破敌对势力渗透颠覆分裂国家和危害国家安全、加强首脑机关保卫工作和保护首长安全等一系列深层次情报研判平台、快速侦破案件及警卫工作的科技举措,以“三牛”精神和实际行动忠实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决捍卫党的执政地位与政治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人民警察来大数据作为推动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大引擎、培育战斗力生成新的增长点,全面助推公安工作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公安科技创新绝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信息孤岛”,而是一项

科技兴警就要大力研发出更多的民生科技,推出新举措,改革“放管服”,使掌上办、网上办、刷脸办、一卡办、异地办常态化,贴近民生、服务人民、改进服务、提升质量。通过科技平台和大数据研判,找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治安问题,群防群治、打击整治并重,完善科技化、立体化防控体系,打防管控并举,依法严打涉黑涉恶、涉枪涉爆、新型网络犯罪、跨国犯罪和“黄赌毒”“食药环”“盗抢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确保治安稳定、人民安全。

力情报研判、维护稳定、侦查破案、治安防控和矛盾化解及群众工作,深入推进执法规范化、科技化建设,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让科技信息化催生执法公信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每一件事情的办理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运用科技力量健全执法监督管理平台,改革执法监督管理机制,深化受立案改革和刑事案件“两统一”改革,加快推进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运用网上执法监管平台对执法办案全流程、全要素、全环节管理,改革执法绩效考核体系,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公安队伍建设是根本也是保证。要运用科技手段来绷紧“严”弦,保持“严”调,严明警纪、纯洁队伍,聚焦实战、强化训练,注重科技化、秉公执法。查摆问题,运用科技推进队伍教育整顿,刀刃向内、刮骨疗毒、自我革命,打一场铁腕

“县中塌陷”是县域整体教育的警示信号

吴汉锋

近年来,“县中塌陷”现象引发教育界持续关注。去年全国两会,有政协委员提出,县中是城乡教育的纽带,寄托着乡村老百姓对教育改变命运的最后期望,县中“塌陷”了,也就打碎了老百姓最后的“教育梦”,建议全面振兴县中教育。今年全国两会,有政协委员再次提出,在不少省份,许多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发展起来的历史名校在一些“超级中学”的挤压下,生源、师资流失,质量严重下滑,辉煌沦为“县中模式”整体消解,“县中塌陷”现象亟须重视并得到妥善解决。

县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正如有研究者所言,高中教育是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国的“软腰”,这个“腰”直不起来,教育强国梦就无法实现,高中教育亟待“强筋壮骨”。县中的困境也引起了教育部门的重视。去年年底,有媒体援引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的话称,“要扩大普通高中中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进一步提高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着力解决‘县中塌陷’问题。”

重视。去年年底,有媒体援引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的话称,“要扩大普通高中中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进一步提高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着力解决‘县中塌陷’问题。”问题是,尽管县中地位重要,“县中塌陷”的表现也很相同——基本上都是优质师生流失,教育质量下降,教育成绩连年不好,教育信心丧失,但导致“县中塌陷”的原因却不尽相同。有些是出于外部原因,比如,省城或者地市的“超级中学”把好师生都给“吸”走了,城市化或者城镇化导致人群发生异常的流动,教育投入“偏科”严重,重硬件不重软件等。有些是出于内部原因,比如,县域教育行政管理水平的低下或者学校领导管理水平的不足,师资的老化或者能力的固化等等。一般来说,内部原因比外部原因更容易被忽视,应该格外加以重视。

由于情况多样,有必要在对“县中塌陷”的具体原因进行把脉问诊的基础上,再对症下药。比如有研究者提出,要提高县域普通高中教育的保障水平,全面提升县域普通高中教育办学条件,实施“县中”振兴人才固本计划,实施优质高中优秀教师中支教工程,在高等学校招生中给予县及县以下中学政策倾斜。这些有力度的措施,具体在应对某一县域或者更大区域时,需要对症下药,辨证施治,综合治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县中固然是一县百姓希望之所寄,是一县教育质量之试金石与风向标,但县中不是孤立的,更不是唯一的。换句话说,县中不可能脱离全县义务教育的基本发展而独善其身。事实上,那些“县中塌陷”的县域,义务教育阶段的质量也难怪可见。笔者在调研中,一些所谓“塌陷”的县中的教师们,一些观点颇具代表性,也发人深省,他们认为,“我们的小学教育支撑不了我们的初中教育,我们的初中教育支撑不了我们的高中教育。高中再拼命补课也于事无补。”

一些县中拼尽全力也就只能维持一定水平,触摸更高的“天花板”,则需要高中、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来共同实现。以县中提升为引领,一体化提升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高中阶段的整体质量,通过县管校聘、学区制、集团化办学、“公民同招”等优化办学格局,通过定向培养和精准培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甚至加强地校合作,引入高质量办学集群等有效办法,推动县域教育均衡迈向高位优质均衡,冲抵“掐尖”和流动带来的负面效果。振兴县中的治本之举正在乎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县中塌陷”更应该是县域整体教育的一个警示信号,其治理应对也应标本兼治、整体考量。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培训与基础教育管理处处长)



更多视频评论请扫描二维码

课程思政重在协同育人

丁义浩

课程思政,就是要深入挖掘并运用各门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有效引导教师发挥课程育人的主体作用,切实把思政教育贯穿于教学实践的全过程,实现各门课程协同育人。可见,课程思政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的、动态的系统,如何真正做到知和育德的有机融合,达到育人和育才的真正统一,是当前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教育价值回归的重点难点。这就要求我们从理念架构、组织设计、实施推进等多方面着手,凝练经验、总结规律、

创新形式、丰富内容,着力构建高水平的课程思政协同发展体系,实现思政教育元素,有效引导教师发挥课程育人的主体作用,切实把思政教育贯穿于教学实践的全过程,实现各门课程协同育人。可见,课程思政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的、动态的系统,如何真正做到知和育德的有机融合,达到育人和育才的真正统一,是当前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教育价值回归的重点难点。这就要求我们从理念架构、组织设计、实施推进等多方面着手,凝练经验、总结规律、

内容的融合度。注重教育内容设计的逻辑自洽和内涵延展,“显隐结合”、“以隐”为主。实践证明,只有做到从设计、实施到效果检验“一盘棋”,以多维的推进举措不断彰显课程的价值属性,做到“课程设计有灵魂、课堂教学有活力”,才能有效释放所有课程的思政教育功能。打造标准与激励创新相协同。课程思政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既遵循课程建设的逻辑,又遵循网络应用、内容、终端需求;既兼顾课程内容的学术性、发展性,又注重建设的个性化、多

元化,做到因材施教、顺势而为。逐渐构建课程思政建设的科学标准,对课程思政的内容、手段、方法进行科学设计,将定量与定性结合,改变惯性的“量化”思维,克服用“完成任务”数量来机械评价教育效果的错误倾向。注重渐进化推进,坚持问题和目标双向导向,杜绝一蹴而就,防止一哄而起、一哄而散,逐渐实现“建”“评”“改”一体化,切实提高课程修订、教材编审、要求在深入教学大纲和人才培养方案中。要结合作业实际和办学特点,在典型示范的基础上实现课程思政、专业体系、学科体系的全链条贯穿,使课程思政由小到大、由点到面,实现全覆盖。同时,要做到创新赋能,鼓励先行先试,将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情况纳入绩效考核、评优奖励等指标体系中,建立起逐步完善的考核和激励相结合的评价体系。

(作者系辽宁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东北大学教授)

短视频不能成为假医生的“行骗工具”

前不久流传网络的“神医”语录视频中,“违背祖训”式行骗令人大跌眼镜。最近的报道,让短视频平台上大量招摇撞骗的假医生现出原形。他们靠东拼西凑、搬运抄袭来的内容维持更新,把健康医疗当成生意,等到被网友扒出黑料,要么忙着撇清关系,要么注销跑路、换个马甲东山再起。真医生费尽心力做科普却难有流量,漏洞百出的假科普不光误导人们面对疾病时的选择,也在贩卖和制造健康焦虑。假医生屡禁不止、卷土重来,根源在于利益。整治乱象,关键在于切断这个灰色利益链条。比方说,注册认证短视频平台对医生身份审核更严格些;再比如落实广告法中关于医药广告的规定,杜绝通过科普视频

间接或者直接发布广告信息。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而是“愿不愿意”。彻底铲除假医生存在的土壤,有待相关部门和企业共同发力。如何防止短视频沦为“行骗工具”,应当成为产品设计、开发、运营过程中的底线要求,成为平台社料,要么忙着撇清关系,要么注销跑路、换个马甲东山再起。真医生费尽心力做科普却难有流量,漏洞百出的假科普不光误导人们面对疾病时的选择,也在贩卖和制造健康焦虑。假医生屡禁不止、卷土重来,根源在于利益。整治乱象,关键在于切断这个灰色利益链条。比方说,注册认证短视频平台对医生身份审核更严格些;再比如落实广告法中关于医药广告的规定,杜绝通过科普视频

找回走失的“数字自我”

高宇

数字信息革命以来,人在网络空间逐渐有了新的对象化存在——数字自我。数字自我的本质是数据体,来源于人的意识的数字化表达和实践活动的数字化痕迹。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活动的丰富,复刻着人的思想意识、性格秉性、活动轨迹等各方面信息的数字自我变得日益“丰满”,但也因为“发育”得太快,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诸多畸形,凸显了数字自我异化程度的加深。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数字自我“碾压”现实自我。当前,网络“自媚”现象愈演愈烈,很多网民耗费大量精力财力“美化”数字自我,呈现出海量“蛇蝎脸”“网红妆”等与现实自我大相径庭的虚拟化数字自我。有很多网瘾沉迷者在游戏中夸张奔放、英勇神武,但现实中却腼腆内向、懒惰消沉。还有众多网民被智能设备绑架,长期脱离现实生活,沉浸在网络活动中不能自拔。不论是“刻奇”“自媚”还是沉迷,不少网民已产生“我就是游戏中的‘我’、现实的我远不及虚拟的‘我’、我要成为网络中的‘我’”等想法,久而久之变得厌弃现实自我、逃离真实生活。虚假、多重数字自我遍布。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身份验证和角色定位也依赖于现实社会关系。网民的身份和教育可以相对自由地塑造,且难以识别和追溯,滋生了众多身份不明且角色多重的数字自我。“多机多卡多待”直接衍生出了“多号多身多面的‘数字众生’”。很多人刻意隐藏现实身份,制造多重数字角色,把网络空间中“肆意妄为”的惯性也延伸到现实生活中,逐渐模糊了现实和网络

找回走失的“数字自我”。数字自我的分裂和迷失。在互联网时代,数字自我是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很多人却使之成为异己的对抗性力量,分裂为自我的对立面。很多网友在现实生活中能够保持理性的自我,但在网络空间中却易受裹挟而表现出“盲动主义”。还有的人置身信息洪流产生自身认知能力和知识水平大幅提升的幻觉,或是因网络生活的便捷而出现“无所不能”的错觉,“宅文化”“自我中心主义”的盛行与此无关系。更有甚者,为博眼球、吸流量,不惜自毁形象,为“泛娱乐浪潮”推波助澜,制造出一些有失道德和体面的负面事件。数字自我异化,源于人的网络实践活动异化。网络实践,本来是人们利用数字化中介从事的主体性的、发挥自觉能动性的新实践形式,但随着网络应用、内容、终端的剧增,很多网络行为日益被平台

找回走失的“数字自我”。数字自我的分裂和迷失。在互联网时代,数字自我是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很多人却使之成为异己的对抗性力量,分裂为自我的对立面。很多网友在现实生活中能够保持理性的自我,但在网络空间中却易受裹挟而表现出“盲动主义”。还有的人置身信息洪流产生自身认知能力和知识水平大幅提升的幻觉,或是因网络生活的便捷而出现“无所不能”的错觉,“宅文化”“自我中心主义”的盛行与此无关系。更有甚者,为博眼球、吸流量,不惜自毁形象,为“泛娱乐浪潮”推波助澜,制造出一些有失道德和体面的负面事件。数字自我异化,源于人的网络实践活动异化。网络实践,本来是人们利用数字化中介从事的主体性的、发挥自觉能动性的新实践形式,但随着网络应用、内容、终端的剧增,很多网络行为日益被平台

说,作为网络运营和公共服务的重要主体,则应承担起应尽的社会服务功能,加大对数字自我的甄别、认证和信用评估,利用技术优势有效引导和规范网民的网络行为。数字自我快速崛起并与现实自我长期共存已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和常态,如何正确认识和理性塑造数字自我是每个网民必须面对的新问题。身处数字时代,网民必须加速主体觉醒,强化让网络服务而非异化人、让技术造福人而非裹挟人的认识与能力,全面提升识网、用网、适网水平。纠正数字自我异化,个体需主动提升网络道德,自觉遵守网络规则,主动适应技术变革和发展趋势,努力调适线上与线下的关系,用自身自控自律将数字自我导向健康发展,实现从被动地“活着”转向智慧地“生存”。(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新闻传播学博士后)

光明时评 中国新闻奖专栏